

熬过疫情的中国创业者，开始申请失业救济金

申请失业金的人，“各有各的不幸”。



2023年9月22日，河南省郑州，大学毕业生在招聘会中。图：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特约撰稿人 白莉莉 发自新加坡

刊登于 2023-11-03

[# 失业 # 创业青年](#)



王德龙的工作微信群经历了数次改名：

2020年，公司初创期，群名：搞钱大吉；

2021年，创业摸索期，群名：今年赚点“米”；

2022年，封城绝望期，群名：勒紧裤带过冬；

2023年，公司注销，群名：（失业）救济总攻略

.....

讲述过去四年的经历时，王德龙先用了“生活状态”这个词，但几秒之后又进行纠正，“还是说生存吧，生存第一。”今年8月，他和四个共同创业的伙伴将公司注销，开始费尽心思申领失业救济金。

在中国职场，失业救济金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词，如果把它拆分成两个词——失业保险和失业补助金，那么大部分打工人都对前者相当熟悉。按照劳动法，公司需为员工强制缴纳“五险”，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。其中，失业保险金由个人和雇主共同缴纳，缴纳比例为工资的1.5%（公司支付）+0.5%（个人支付）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月薪5000元，那么公司每月为你缴纳失业保险75元，你自己每月从工资里扣去25元。

那么，失业救济金到底谁能申请、如何领取呢？

对于包括王德龙在内的很多“前职场人”来说，这两年，他们生平第一次理解了失业救济金是怎么回事。



2020年5月13日，北京，疫情期间，求职者在前往购物中心寻找工作机会的路上。摄：Tingshu Wa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“你总想攥紧最后一根稻草”

早8:30，群里信息响个不停。王德龙瞄了一眼，又是一堆“申领攻略”。他把手机调成静音，继续睡觉。

今年8月，别人眼里的“公司法人”和“个体户老板”王德龙，决定把公司注销。他和四个合作伙伴开了一次线下会议。“今年过去了一半，公司没接到一单业务。都别彼此耽误了，干脆我们把公司注销吧。”这是王德龙当时的提议。

半分钟内没人吭声。作为一个主打平面视觉设计的团队，公司在刚成立的2020年接到4笔被王德龙称为“利润不小”的订单，“每个人月收入能到2万。”他们公司没租办公室，大家远程办公，偶尔碰面开个会。

但随后两年公司业务急转直下。“尤其是2022年底，广州开始大规模封城，从9月起就没有一单业务。等到11月，我直接把群名改成‘勒紧裤带过冬’，所有人都连声叫好。”王德龙说。

公司2022年全年只接到了两笔业务，“利润一共20万，还得五个人分，每个人平均每月不到5000块。”

王德龙说，自己生平第一次感到绝望。他的妻子在一家酒水产品的代理公司上班，“累个半死每个月就5000块钱，就这还不敢大意，生怕丢了个目前还算稳定的饭碗。”儿子今年读初一，本想以“省钱”为原则入读离家最近的一所公立中学，“但学校氛围很差，让小孩往校又怕他被带坏，我和他妈一跺脚，索性报了个私立中学，每年学费8万，够我喝一壶的了。”

王德龙在2020年前后过的是“两种日子”。

第一种日子，是朝九晚七八九的内卷职业，连5天年假都休不满。每天被闹钟、KPI和微信群里不断被@的信息叫醒。有次他把聊天群设置为消息免打扰，起床之后发现半夜被领导“圈”了四五次，“说让我赶紧过一遍第二天要给客户看的视觉案。”

王德龙正在过的第二种日子，是所有打工仔憧憬的日子——睡到自然醒，每天有大把时间挥霍。但他并不适应。王德龙说，过去睁眼一摸手机，N条未读信息，“现在倒好，有时候一周都收不到一条。”好不容易盼来一条，睁眼一看，显示是人社局发来的失业金申领进度。“气得我把手机往床边一扔，给我儿子吓坏了。”

年过五十的王德龙用“退无可退”形容这两年的职业选择，“你总想攥紧最后一根稻草，过去我以为，这根稻草会是更内卷的职位和工作。”但他越往后越发现，和不断下行的经济一样，自己的职业曲线也以俯冲的姿态继续向前。在打工仔时代，他还能靠工资每月“存个几千甚至小一万”，等到刚创业那阵子，职业曲线和甲方预算直接相关，“说白了就是看天吃饭。金主能吃上肉，我们这些下游的乙方才能喝口汤。”



2023年5月24日，北京一家购物中心内的咖啡馆，一名男子在小憩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2022年下半年，王德龙都不知道自己是“怎么熬过来的”。公司接不到单，他不得已花3个月学习一些数控机床的“皮毛技术”，为的是进小舅子开的数控加工厂做点事，“至少能填补点家用”。

也是从去年下半年起，公司股东之一的张文韬也开始了自己的“搞钱大计”。他注册了淘宝账号，在上面接一些单价不高的设计稿，“比如企业宣传册，甲方报价50块/页，这么低的价一般‘设计狗’都不会接，但我不管，有单子我就接。”

按照王德龙和张文韬所在的平面设计领域的行价，宣传册的单项设计费一般在100-500块不等，“大牌点的设计师能四五百一页，就算没什么经验的设计小白，也能拿到一两白的行价。”王德龙说。

但疫情后“一心省成本”的甲方需求大减，让蓄势待发的乙方找不到用武之地。“多数老客户都说，他们内部用来制作和宣传的预算大幅缩水。”王德龙说，有个甲方直接发来一句话：未来三年恐怕再难合作了。

当王德龙得知张文韬连50元/页的宣传册设计都接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——你就是行业卷王。但转念一想，他又觉得80后的张文韬“挺可怜”。

“他没结婚，没房子，一个人生活。2020年和我一起从广告公司辞职后，本想一起大干一场，但没合作、没业务、没利润，”王德龙说，“我能进工厂操控机床，他为什么不能接50块/页的宣传册赚点生活费？”

和这两位遭遇类似的，还有已经找了两年工作的90后程龙。他今年33岁，曾在某知名4A公司做创意文案，一度做到“资深创意总监”的职位，开会时在椭圆桌上“清清嗓子都没人敢交头接耳”，一些同龄下属隔三差五“老师老师”地喊他，“没事总爱给我买个咖啡奶茶什么的，就这我还对他们爱答不理”。

得知自己被优化的消息是2022年初。刚过完元宵，领导把他喊到那个空旷又阴冷的办公室，翻了一下桌上的表格，动情地感谢他对公司的付出，接着，“优化中层”的意思被领导委婉托出，末了手指敲一敲桌子，“你再想想办法，看看有什么其他出路？”

程龙说，领导用食指敲桌子告诉自己被裁的那一刻，他脑子里浮现出《纸牌屋》里弗兰克·安德伍德那个经典的食指中指轻敲桌面的场景，“我也被赶出纸牌屋了。”

被裁后，程龙和公司另一个总监吃了个饭，后者告诉他，现在很多公司的裁员都从中高层开始，“一是为了警示底层员工，你看，你的部门领导都可能被炒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干活？二是节约成本开支——那些年薪制的中高层，在很多老板眼里是公司节流大计的最大阻碍。”程龙说。

离职后的程龙没打算创业，“身边创业失败的朋友一大堆，我还是务实派，想再找份工作重新开始。”

但他的愿景在现实面前碰了壁。从去年初到现在，他通过不同招聘平台投递了234次简历，只收到29次回复，其中面试邀约16次。“这么算下来，我80%的投递，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拒了。”

虽然在公司任职总监期间积累了一些存款，但程龙最怕的，就是像王德龙那种“突然一下，你的工作和职业就俯冲下去，没有任何转折和缓冲”的状态。这或许也是这群曾经拥有稳定工作，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打工人共同的担忧：失业保险于他们而言，或许算不上续命性质的救济性补助，但为这些因为丢失工

作、创业失败或各种原因而与体制脱离的人，带去了些许安全感。

“越投简历，你会发现30岁以上的求职者越没有优势，不管你曾经是企业高管还是行业资深。”程龙说。在他看来，一个暂时缓解求职焦虑的“缓冲地带”就显得尤其有必要。



2023年9月13日，北京一家卖名牌家具的商场外，一对夫妇坐在一起看手机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“既然大家都想拿失业保险，那公司就注销吧”

2023年春节刚过，已经两个月没有群聊的“勒紧裤带过冬”微信群，突然被张文韬随手发的一条新闻链接“激活了”。

这条《没工作的你，一定记得去领失业保险》的新闻，虽然全文只有不到500字，却意外地点醒了群里的五个人。转发这条新闻的张文韬有点后知后觉，“转完我就没管了，等一个小时再点开群，有一百多条未读信息！”

根据王德龙的回忆，即使是公司刚注册并连续获得多笔业务的2020年，群里也“从没有出现过如此踊跃的发言和讨论”。一个做视觉技术出身的股东第一个跟帖：“那我们五个是不是都可以去拿失业救济？”，随后有人附和“我觉得应该可以”，但王德龙站出来浇灭了其他人正待起势的热情：“大家都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公司呢，这能算失业吗？”

一盆冷水浇下来，半天无人回应。一个小时后，张文韬回了一句：把公司注销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算失业人士了？

在王德龙担任公司法人的过去四年里，他从没动过“注销公司”的念头，即便是去年底因为严格的封控政策，导致公司业务陷入停滞状态时，他对公司未来的设想都是“肯定会慢慢复苏”。

但张文韬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个人的一致同意，“既然公司没业务，那我们还开它干嘛，不如注销了，哥几个一起申请救济去。”有股东在群里这样回复。

“既然大家都想拿失业保险，那公司注销就注销吧。”

王德龙至今记得，自己在群里发完这句话后，庆祝和鼓掌表情包开始横飞。张文韬把群名改为“搞钱（我指的是失业救济金）”。王德龙想了想，又把群名改成了现在的这个：（失业）救济总攻略。

王德龙感觉自己的处境很尴尬，“我都50了，不可能再去公司上班了，卷不动了。但离退休还有十年时间，只有薅一笔算一笔了。”他后来私聊问过群里几个人对未来的打算，“有的说想再重新找找工作，有的说管不了什么未来了，先把能申领的救济金拿到手再说。”

在微博里搜索“失业救济”，会发现相关有用信息少得可怜，甚至大量搜索结果都指向了一条大洋彼岸的新闻：美国10月2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21万人。

这也折射了中国失业救济金的申领困境——一方面信息太少、认知不足；一方面是申领制度有诸多限制、更难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。

社交平台上充斥着一类文章：《千万不要领失业金，后果很严重》《为什么不建议领失业金》。这些文章论述的理由主要有：1. 会在档案上留下记录，影响以后找工作；2. 影响社保缴纳，因为有些城市规定领取失业金期间要停缴社保——这会影响以后的养老金数额；3. 申领手续麻烦、失业金金额低，与其费劲力气申请不如尽快找工作。

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《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2年末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，结合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员人数（45931万人）计算，失业人口为2673万人，但当年未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97万人，仅占城镇失业人口的11%——这一数据长年徘徊在10%左右。

中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，是以正规就业和劳动合同作为参保前提，而且缴费年限必须满1年后，才有申领资格——仅这一条就难倒了绝大多数农民工、自由职业者以及“毕业即失业”的年轻人。

失业金的金额也被质疑过低。尽管各城市的失业保险金并不相同，但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的80-90%左右发放，失业补助金则是稳定在800-1000元之间，按月发放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失业金申领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：真正需要它的群体没有资格申领，有资格申请的人觉得它“杯水车薪”、“有申请的功夫不如重新找工作”。但近两年，一些从前不屑申请失业金的人发现——工作没那么好找，“杯水车薪”的失业金也成了救命稻草。

2022年夏天，程龙花了三天时间了解失业金的申领事宜，并最终通过主动停缴三个月社保的方式，成为了享受失业补助大军中的一员。在他生活的广州，领取失业金的年限和申领者的工龄有关，如果你是工龄超过20年的申请者，那你可以拿满24个月的失业金，每月金额在2400元左右。而像程龙这种研究生毕业后才就业、工龄只有六年多的申请者来说，他只能拿15个月的失业金。

不过他觉得，“15个月的过渡期足以，相当于给了我一年多时间重新找工作。”程龙说。

一位不愿具名的、来自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，失业金的申请并不困难，只需下载一个当地办事机构app，填好个人基本信息，并上传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/离职证明等材料，就可以在线办理。审核一般需要20个工作日左右，通过后失业金会每月自动转到申领者提供的银行卡上。

“我还是建议所有符合申领条件的朋友尽快办理。”该工作人员说。他给出的解释很简单：政策无法预知，未来不可预测。



2023年6月9日，北京举行的招聘会上，求职者和招募人员交谈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“搞失业保险的人，各有各的不幸”

此前“半个月都没人吭声”的微信群，从今年8月起开始变得“生龙活虎”。

关于失业保险的申领门槛，是群友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。以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广州为例，在广州，员工非本人意愿失业后，且失业保险缴纳满1年者，可申领失业保险金。于是，“非本人意愿失业”的这个表述，成为了群里讨论的核心主题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，那你就无法申请失业保险金，但只要你还未工作，你可以申请每月不到一千元失业救助金。

群友们更感兴趣的，显然是金额更大的失业保险金。按照规定，广州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%，也就是 $2300 \times 90\% = 2070$ 元，这在张文韬看来，“都能解决我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。”

那么，群里到底有几个人有资格申请呢？只有一个。王德龙和张文韬的上份工作都是主动离职，按不具备获得失业保险的资格。“如果知道要被公司炒才能拿失业保险的话，我当时肯定不主动辞职，赖也要赖到被炒鱿鱼。”王德龙说。

张文韬和王德龙曾是多年同事，两人在一个部门工作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两人长期饱受部门领导的欺压，王德龙一气之下递了辞职信，而张文韬则索性摆烂，“消极怠工你知道吗，就是交代给你的事就拖着，不紧不慢的。”

本想拿捏公司的张文韬，最终被公司完全拿捏。公司以“无法完成业绩”为由辞退了他，他不服要求N+1赔偿，但公司HR拿着当年签的续约合同里的一条条细则向他解释，“喏，合同里明确规定，乙方（员工）无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，或有出现延迟完成项目情况，甲方（公司）有权辞退乙方。”

张文韬傻眼了。随后HR递给他一张离职申请表，“填吧，就当主动辞职了。如果你以后找了家，我们保证在背调的时候帮你说好话。不然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。”

出于对未来的考虑，张文韬忍痛签下了的离职申请表。

“只能说，搞失业的人，各有各的不幸。”王德龙说。

上述人社局工作人员说，像王德龙和张文韬这种情况，“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公司，给自己出具一份被辞退证明，然后盖上公司的公章即可。”

一切瞬间豁然开朗。



2023年9月20日，北京一家户外购物中心的手表广告牌附近，送货员在手推车上整理包裹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“你们的失业保险攻略，能给我一份吗？”

在注销公司之前，作为法人的王德龙做了一件被其他股东称为“最功德无量”的事，那就是他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人，分别开具了一份员工辞退书，上面“痛陈”该员工的各种不端和陋行，末了来一句“基于以上所述，本公司决定解除与XX员工的劳动关系”。

自己给自己开具辞退书的时候，王德龙觉得这件事有点可笑。“我活50年了，过去在职场一直以薄脸皮自居，最怕就是被集体和团队羞辱。没想到自己成立了公司之后，为了每个月两千块钱，自己把自己劝退了。”

失业保险的资料递交后，群聊里的五个人正在等待人社局的审核通过。等待过程中，王德龙的微信不断收到了添加好友的申请，有过去认识的朋友，也有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。“认证信息通常都是先介绍一下我是谁，然后直奔主题‘想咨询你一点失业保险的事’。”

原来是群里的一位股东告诉别的朋友申请失业保险这件事，于是，关于“（失业）救济总攻略微信群里都是专家”的说法不胫而走。王德龙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：“你们的失业保险攻略，能给我一份吗？”

“每次我都跟这些人解释，我不是专家，我只是在办失业保险”，王德龙说，“但很多人还是一口一个请教请教，没想到现在找不到工作，想用失业保险填补家用的人这么多。”

截至本文发布时，已经领到4个月失业金的程龙还没找到新工作。“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：一年内要找到一份工作，哪怕再基层我都干。”他说，自己在每个招聘网站都设置了一键自动海投的按钮，并且开始考虑修改简历里的“职业经历”部分。

“我打算淡化过去管理层的经历，更多地强调自己做过那些具体的事。希望这会比过去更简单一点。”



2023年9月18日，北京，居民走过一个废弃的商场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应受访者要求，王德龙为化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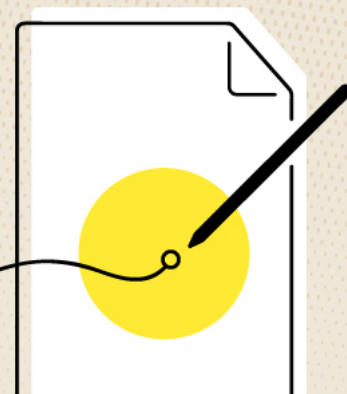
[#失业#创业青年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

填寫問卷，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

訂閱端傳媒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

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